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新课题资料选编

(内部参考)

山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编 者 的 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派别、运动和国家遍布全球，出现了一个百家竞争的空前未有的多元格局。与此同时，伴随着新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1988年8月在太原召开了全国学术界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课题研讨会”。对当今的时代特点、世界格局、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问题、当前改革的新趋势、民族独立国家的新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会学者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新战略、新趋势发表了很多新颖的见解。我们为同行吸取专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参会的论文和大会发言略加整理，汇集成册，供从事研究、宣传、教学的人员内部参考。因资料取自内部讨论会并以保留其原始面貌为特点，故有关观点、资料如公开引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敬请读者注意。

1988年10月

目 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新战略、新趋势……………高 放 (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赵 曜 (49)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趋势……………张泽森 (65)

世界主题的转变给社会主义

带来的深刻影响……………王兴斌 (70)

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迫切问题……………洪韵珊 (86)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刘昫献 (99)

新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思考

……………林今柱 (112)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刘书林 (119)

求实和开放是繁荣科学社会主义的

一个重要条件……………张海山 (129)

全球意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思维

……………蔡 拓 (135)

开拓新理论，构想新模式……………冯育民 (148)

关于意识形态体制改革的趋势·····	徐鸿武 (164)
论“民主社会主义”可供借鉴的经验·····	杨祖桐 (168)
试论共产党与社会党之合作·····	赵树海 梁中晦 (183)
对社会党国际的几点看法·····	张志斌 (199)
社会党国际简介·····	张志斌 (213)
“绿党”和它的“社会主义”·····	王 谨 (233)
应当重视对苏东各国 持不同的政见者的研究·····	徐耀新 (246)
(附录)	
国际形势座谈会纪要(节选)·····	(251)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节选) ·····	(263)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新战略、新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高 放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是很多的。我们要着重讨论一下新形势、新战略和新趋势。我想先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谈点初步看法，抛砖引玉，旨在引起专家们研讨和争论，我一定认真听取各位发表的高见。

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五年前，即1983年，我曾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形势作过这样的概括：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是遍布全球，百家竞争，三分天下，两方挑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遍布全球，百家竞争，应该说是大好形势，是兴旺发达的一种表现。十九世纪时，社会主义只限于西欧一隅，二战前只在苏联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战后扩展到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各大洲都有很多社会主义政党、派别。百家竞争中，我曾归纳了九家：大、中、小各三家。三大家就是共产党、社会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这三大家都是执政的，不全是在野党，有政治实体和社会实体，所以三大家形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三分天下的局面。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15个，社会党执政的国家有28个（前几年是24个），民族主义政党执政的大约有40个，共

有80多个。全世界是170多个国家，现在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差不多占了一半。这怎么能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局面呢？

近几年来，中三家、小三家都有些变化。在小三家中，我原来认为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是影响较小的三家。原来把封建社会主义作为一家。因为直到七十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搞的白色革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根据这几年发展变化情况看，封建社会主义这一家已消失了。因为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以后，霍梅尼搞的伊斯兰原教者主义，不再提社会主义了。而在中东、东亚一些地区也没有找到有关封建社会主义的新材料。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象沙特阿拉伯等也都在走特殊的现代化道路。由于特殊的资源——石油，使它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平均每人约2万美元）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几年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在减少，影响在削弱，我的看法，托派应由中三家列入三小家之一。托派活动减少与世界科技发展有关。因为世界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多方面，包括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托派鼓吹的世界革命的极“左”思潮影响越来越小，据我个人估计，托派和“第四国际”的影响今后还要下降减少。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已开始给托洛茨基平反。现在布哈林已恢复党籍，托洛茨基看来不会恢复党籍。他后来的派别活动，的确是他的错误，但苏联已肯定托洛茨基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这个问题已平反，随着苏联今后的改革，也许会对托洛茨基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涉及到历史上对托派和“第四国际”的政策问题。我最近有这样的想法，托派“第四国际”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错误处理人为造成的。否则托

派“第四国际”未必能够成立起来。我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国历史上有过巨大的功绩，但也犯过重大过错，可以说，托洛茨基这个人是一个有奇功殊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期反对沙皇制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火星报》时期和列宁合作过。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不同意，才没有成为《火星报》的编委。普列汉诺夫嫌托洛茨基文字过于花哨，华而不实，倒不是政治上与他有原则分歧。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主要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以后，即有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两派分歧以后，托洛茨基从1903年到1917年，长期在布与孟两派之间动摇不定。托这个人工作能力很强，但爱搞宗派活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停止动摇，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所以1917年俄国党六大吸收他入党，由于他的历史影响和声望，六大就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又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领导了10月24日彼得格勒的起义。这一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都承认，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文章里专门有一段话，肯定托洛茨基的功绩。可是斯大林不实事求是，后来批判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都有他的功绩。他后来的观点是有些极“左”的思想。但是他对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批评，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批判还是有根据的，并非一无可取。列宁临终前，最担心党内两个卓越领袖的分裂。不幸言中，后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果然分裂。分裂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处理是很不恰当的。他在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与党内多数领导人有分歧，应遵循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党内最高处分就是开除党籍。过去认为1927年托洛茨基组织示威游行，反对苏维埃，这些都是言过其实。在一

个有正常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对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还应该允许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不能认为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但是1927年斯大林将他开除后,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进而把他驱逐出境,这种处理方式今天可以重新探讨。这样做至少使他便于在国外组织反对派开展敌对活动,所以他在1938年建立了“第四国际”。如果不是这样处理,还允许他在国内作为一个对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允许他在符合国家法律范围内,在国内可以继续发表不同意见。我认为托派“第四国际”本来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说托派“第四国际”是斯大林人为造成的。不仅是人为造成这一国际组织,而且到了三十年代以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又升级了。作为反革命匪帮、杀人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等对待。这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包括我党在内。如果不是斯大林后来进一步对托洛茨基派的升级,我认为到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各国共产党和托派合作是有可能的。过去硬把托洛茨基派说成是法西斯的间谍、特务,甚至说中国托派是领取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看来缺乏充分根据,是捕风捉影。托洛茨基还是主张反法西斯的,有些托派人物也受到法西斯的迫害。还有这样一个材料值得我们注意,在“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10月间,陈独秀在四川派代表罗汉访问延安,想与共产党重新恢复合作,当时毛泽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还动了心,考虑接受这个要求,张闻天与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可是这件事遭到王明的反对,王明1937年11月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声色俱厉地大骂“托匪”,“汉奸”,认为如果与托派合作,会激怒斯大林,会受到斯大林的谴责。结果和陈独秀合作之事未成。这里涉及到对陈独

秀晚年评价的问题，值得探讨。由于受到斯大林对托派的错误处理的影响，我们解放后也把所有托派分子当作反革命，关进监狱。在上海监狱中死了不少，有个别的幸存者在获释后近几年还写了一些回忆录，如《郑超麟回忆录》等。总之，托派问题是一个历史冤案，把他们作为“托匪”、“反革命”来处理，而不是作为共运中的一个派别对待，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随着苏联对托派的平反，随着世界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们采取正确的对策，今后托派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少，成为一个小派别。这一点，古巴革命以后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例证。拉美本来是托派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古巴的一些托派分子在革命胜利以后，参加了古巴共产党，这是因为古巴共产党没有受到斯大林框框的限制。可见我们对待托派如有正确的对策，这个派别是不会长期成为共产党的死对头的。

中家也有新变化。中家原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家、无政府主义一家、托派一家。这几年托派已变为小家，又有一个新的中家出现，值得重视，这就是世界各国的“绿党”。“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新崛起的社会主义派别中的一个中家，力量越来越大。

“绿党”当中有些人原来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前几年我把它算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家，这几年“绿党”的发展情况有所变化，参加“绿党”的不仅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些原来“左”派共产党人，如参加联邦德国“绿党”的就有一些原来是马列共产党人。“绿党”还包括和平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其中有工人、职员、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等等，成份比较复杂。“绿党”这一家近几年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原来偏重于学术研究，

“绿党”则是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80年代以来，他们发展成当代世界值得重视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且是国际性的政治力量。“绿党”开头只是些小组织，三五成群，各自为战。这几年逐步形成全国性政党，并已发展为世界性政党。1987年8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绿党国际代表大会，欧美有20多个国家，300多名代表参加。“绿党”的主要队伍在西德，它现在已由一万人发展到五万人。同情者，已超过一百五十多万人。西欧已有七国的“绿党”代表被选进议会，甚至在欧洲议会中也有席位。“绿党”主张生态社会主义，它要维护生态平衡，实行社会正义，基层民主，要以小规模技术取代大规模高技术。我认为应把“绿党”作为一个新的中家，而且是第一中家，因为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恐怖主义那两家影响更大。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遇到西方的挑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另一方面是非科学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这样一种基本形势近几年在继续发展着。那么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究竟如何看？国内外理论界的意见是不可一致的，有的持乐观主义的看法，有的持悲观的看法。乐观主义的看法要以苏联理论界为代表，前几年，苏联理论界有点盲目乐观，他们认为当代社会主义还处在高潮。以1983年出版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世界大变革中的共产主义》为代表，他向读者展示了世界革命蒸蒸日上，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他认为现在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都是“生气勃勃，日益发展的社会组织”。近一两年来，苏联理论界开始有了变化，承认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著名政论家鲍文为代表，他发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给世

界树立好的榜样；当代新科技革命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一些新的挫折。还有一些同志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消极面看得多了一些，提出三方面的证据，说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不大景气。一、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遇到很多难题，面临难关和险关，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方面有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并且取得了显赫成就。最早提出改革的南斯拉夫，现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外债很多。前几年认为匈牙利模式好，但是现在匈牙利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今年5月总书记卡达尔辞职下来了。苏联也遇到很大阻力，中国的改革出现不少问题。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也有挫折，更大的的是共产党遇到的挫折。许多西欧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票数下降，党员人数下降，党内斗争与分裂加剧，处境不妙。意大利共产党本是西欧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可是它的党员人数在近两年减少了30万，原来有180万，现在降为150万。西班牙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分裂，一个党变成了四个党。前几年，人们对欧共抱有很大希望，现在这种希望正在消失，有人认为西欧各国共产党这样发展下去，再过30——40年大概要全部自行消失，退出历史舞台。三、第三世界各国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搞社会主义的原来有40多个国家，这几年也在减少。有的因外国入侵，不搞社会主义了，如格林纳达、非洲的几内亚、在塞古杜尔死后，新的领导人搞社会主义了。非州许多国家的例子证明，搞资本主义的欣欣向荣，搞社会主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肯尼亚和赞比亚是邻国，肯尼亚走资本主义道路，日子越来越好过，赞比亚搞社会主义，处境不好。有的同志对非州社会主义作悲观的估计，说60——70年代是非洲社会主义的高峰，80年代是落潮，非洲社会主义越来越少了。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对非洲

来的朋友曾提出还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搞社会主义。可见当代社会主义处境艰难，前途渺茫。还有一些国际朋友对当代社会主义持完全否定的估计。1985年9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罗·斯威齐在会上提出：现在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讨论会，请问现在世界上有社会主义吗？根本没有。斯威齐是美共左派，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以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为标准，马克思预测欧美首先实现社会主义，而现在欧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东方不发达国家搞的都是社会主义，那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后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他也承认斯大林搞的不是资本主义，但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

概括起来讲，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估计。有过于乐观的估计也有过于悲观的估计。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肯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局面，遍布全球，百家竞争，这应该说是大好形势，三分天下的局面还是没有变，还在继续发展。前面所说一些同志列举的种种论据，只能证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我党的形势还是好的，这些较为严重的困难有待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采取新的战略。现在出现这些新困难，说明这些国家共产党对新形势认识不充分，没有作出战略的根本转变，如果对新的形势有新的分析，实行新的战略转变，我党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还是光明的。但这个新战略的转变看来需要若干年，不可能一蹴而就，难以立竿见影，马上成功。

我认为对当前面临的挫折和困难应该有新的看法，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尽管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应该看到，这几年改革有新的发展，新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有新进展。社会主义国家在50年代是团结一致，结成统一的阵营，后来一分为三：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三角对立。这几年显然有了很大进步。1983年我们承认东欧五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也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回顾1982年十二大时，虽然不再用社会帝国主义，但是仍然没有明确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同志访问中国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有变化，有的国家也开始松动了，如阿尔巴尼亚，在霍查之后，现在阿利雅与霍查有明显的政治分歧。在改革开放方面，初步迈开了步子，虽然不象我们那样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但是也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三年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来东欧的改革，象南斯拉夫、匈牙利是走在苏联的前面，匈牙利前几年的改革，被人们认为是“静静的改革”，即保持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不遇到苏联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这三年的改革很明显已走在东欧各国的前面，特别是最近刚刚闭幕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觉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起点。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不算过高，也不算过低。有的同志比我作了更高的评价，认为十九次代表大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觉得个别的决议是有划时的意义，而整个会议只能说改革的新起点，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了新的希望。

这个新起点，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就新在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心议题，而且作出具体决议，制定出一些新措施。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弊病的根源主要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制度集权，首先表现在政治体制中。社会主义

国家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影响最不好的就是缺少民主，所以西方称我们是集权社会主义，即权力极度集中的集权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必须从分权开始，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我们给企业以自主权，最早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这都是分权，是经济上的分权。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我的看法是在整个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起先行、领导作用。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局面不改变，仅仅是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局面的改变，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改革，从农村改革转入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中出现的“官商”现象，以权谋私的现象，党风不正的现象，究其根源，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相应地跟上。苏联这几年改革，在经济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有人认为，苏联的改革是只动政治体制没动经济体制。不完全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一上台，1985年8月会议，首先就是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随后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三年的改革经验，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戈尔巴乔夫在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深切地讲到：现在改革进程遇到现行政治体制的阻碍挑战，所以他在讲话的一开头表示不同意阿巴尔金的看法。他认为阿巴尔金的看法具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的味道，“对我们决定进行的改革上层建筑根本不予重视”。也许有人认为，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改革应当从经济着手，方符合唯物史观。这些同志忽视了政治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先导、先行作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先夺取政权，先建立政治体制，然后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文化体制。而且我们的经济

体制、文化体制基本上是按我们的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来建立我们高度指令性计划的经济模式，高度统一的文化模式，高度封闭的对外关系模式。可以说，我们的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体制都是从我们的政治体制派生出来的。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情况，就使得我们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应该占有优先地位。

上面我讲到了从苏联党十九次代表会议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一个新论点、新希望，这就是它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首要地位，成为代表会议的中心议题，这次代表会议给我们最大的鼓舞就是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熟悉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了解，代表会议本来是苏联于1905年开创的，后来代表会议是作为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检查工作并为下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一个中间性的高级的权力和机构，按照党章规定，代表会议的权力低于代表大会，甚至低于中央全会，因为代表会议的决议还需要经过中央全会批准才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如中央全会，但一般地讲，代表会议是介于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之间的一个高级权力机构。苏联党在十月革命以后，本来按列宁那个时候的做法，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是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这是体现党内民主。党的重大事情都得在党代会上解决，不得在中央全会上解决。因为中央全会只是一个执行机关，后来，这种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传统被斯大林破坏了，代表会议年会制的传统也被斯大林破坏了。所以苏联党历史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第十八次代表会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时间竟相隔四十七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以至于现在的一些年青记者都不熟悉这个情况。我留意了一下报纸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在有一次报道中，都

把代表会议报道成代表大会，出了一个差错。

这次代表会议就其成效来说，已相当于一次代表大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讲，是六十年来所没有的，就是说，它的民主气氛是60年来所没有的，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苏联党历史上代表大会上有比较重大的争论的最后一次大会是1927年的十五大，到1930年的十六大就是一统天下了，斯大林把所有的反对派都打倒了。十六大以后，苏联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成为对中央委员会歌功颂德的大会，不能对中央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提出什么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一次代表会议对中央领导人、对中央委员会都有不同的意见，还有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所以党内民主空前活跃。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就其发扬民主来说甚至超过列宁时期。在列宁领导时期，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开得很活跃，但是列宁时期还有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情况，就是党内有不同的反对派，什么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等。当时可以公开组成反对派，而这次代表会议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组成公开的反对派，所以这一次会议没有扣什么帽子，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进行表决。就这一点来说，还超过了列宁时期。

毛主席有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他总结多年的政治经验，概括得很好的，可惜他也没有做到。他对于党内的不同观点，是党同伐异，派同伐异，以至把持不同观点者作为党内的走资派彻底打倒，实际上他在党内是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观点，党外虽有民主党派，基本上也是当摆设，在拥护共产党的前提下，个别问题上可以补充一点小意见，重大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这些做法，实践证明是不好的，不对的。我觉得，共产

党内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時候，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应该说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是党内民主正常化的表现。但是我不赞成在党内形成组织上的派别，这是不正常的，既然在具体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很难要求有一部分同志在各种问题上意见都一样。党内有不同意见，最后应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进行表决。

这次十九次代表会议，在这方面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不仅有着党内民主的气氛，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决定，在政体改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会对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如，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上作了具体规定。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弊病，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色彩，不符合民主共和制制度的要求。但斯大林逝世已经三十五年了，苏联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赫鲁晓夫时期试图进行解决，但是又留下了一个大尾巴。大家知道，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二十二大党章规定：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当时代表大会是四年一届（五年一届是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开始的）那么三届就是十三年，过去的任期，即使不算，从1961年算起，这就够长了。但是党章后面还规定：享有公认威信，具有高度政治品质的党的活动家，在连任三届以后，有四分之三的赞成还可连选连任，实际上赫鲁晓夫还是给少数人的终身制开了绿灯。所以赫鲁晓夫如果不是在1964年被迫辞职的话，他肯定也是搞终身制。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十八年，还是搞了终身制，即从1964年58岁到1976年76岁病故。